

# 不拘一格育人才

李国杰

55年前（1957年），我从邵阳市四中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邵阳市二中，成为高27班一名常坐第一排的矮个子学生。当母校110周年校庆之际，回首往事，心中既有对母校培养教育的感激之情，又有对如何办好中学教育的深刻反思。

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是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头上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过去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光环。我曾想过，我身上的学者素质与高中阶段的学习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至少有两种素质是在二中读书时养成的。一是好学求知精神，二是要真正理解基础知识的学习态度。

二中历来是邵阳的读书人向往的“学府”。我进二中时还是一个14岁的孩子，但从初中开始在心中燃烧的求知欲望越发不可收拾。初中时主要看各国的民间故事，也开始着迷于泰戈尔的“飞鸟集”中似懂非懂的诗句。到了二中，不但像其他同学一样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流行小说，而且收罗了巴金、冰心、老舍、张天翼等作家的所有小说散文，一本接一本的阅读。比如有一学期专门读巴金的小说，不仅读大家熟知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还包括一般同学不知道的长篇小说“火”等。当时我国出版的西方名著很少，只能借到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小说。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到西蒙诺夫、肖诺霍夫，几乎所有能借到的苏联小说都读了一遍。我读小说的重点不是关注情节，而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在以后的坎坷生活中我交了不少文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朋友，可能与这段经历有关。

当时二中科学馆楼上的图书馆并不大，但课间休息时图书馆的窗口总是围着一大堆学生在借书。上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课外参考书和科普读物极少，但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的一套丛书“趣味物理学”、“趣味力学”、“趣味代数学”、“趣味几何学”，“趣味天文学”等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后来报考北大物理系都是受“趣味物理学”的影响。我也读过解放前出版的“科学概论”，其中关于数理逻辑的有趣悖论，为20多年后引导我走上研究人工智能的道路埋下了种子。读书成了我一生最大的嗜好，我要感谢二中培养了我喜欢读书的本性。

二中的老师水平很高，给我上过课的有伍东白、杨秉礼、黄骏、谢树棠、刘程、

王香耕等老师，其中有些老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解放初期人才奇缺的时期，他们能安心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当老师，真是难能可贵。黄骏老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数学概念讲得清清楚楚，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高中学习时我就注意要真正理解各门课程讲授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而不是满足于解题方法。记得高三时学校举行一次物理竞赛，只有一道题目，既涉及抛物线运动，又涉及电磁感应，从其他书中不大可能见到这样的题目。基于对基础知识的透彻理解，我以最高成绩获得第一名，奖励了一只钢笔。1960年我参加高考，物理考了满分100分，我想如果不将物理课的基础知识谙熟于心，可能难以有这么好的成绩。在二中形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我一直带到北京大学和出国留学，使我终生受益。

青少年时期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1968年北大“复课闹革命”时，研究理论科学的学者已威信扫地，很少大学生已不敢学习与理论研究有关的专业，我还是坚持报了理论物理专业。但坦率地讲，我的天赋、家庭背景和中学教育并没有造就我成为大科学家，文革十年的动乱更使我失去了可能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宝贵青春年华。近20多年来我能为国家做出一点点成绩，主要是靠时代的机遇和我领导的团队的顽强拼搏。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而是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2005年，美国权威咨询机构Hudson 研究院给美国国会的重要报告中，例举了三个中国自主创新的代表性成果，其中两个（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和龙芯CPU芯片）都是由我领导的中科院计算所完成的。完成这两项艰巨的任务都需要对所选定的事业有百折不挠的毅力，而形成这种不畏艰难、不怕挫折的性格可能与我高中阶段的特殊经历有关。

我的三年高中生活是在国家执行极左政策的困难环境下度过的。刚进二中不久，在邵阳师范教书的父亲就被错划为右派，我一下子成了“黑五类子女”。由于父亲的工资减半，难以负担一家四口生活和我两兄弟的读书费用（我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因此我在二中读寄宿几次被通知“停餐”。最让人伤心的一幕发生在高考之前，学校按每个学生的家庭出身将毕业生分成四类，第一类可录取军事院校和重点本科，第二类可录取一般本科，第三类只能录取大专，第四类则不予录取。高考之前，每个人的命运就已经确定。我1960年的高考成绩也许算得上“高考状元”，但是，因为被

划在第三类，只能被尚在筹建中的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录取。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我国的元朝实行过，没想到700多年后还降临到我的头上。一个国家能否正常健康地发展，最起码的条件是人人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机会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由于法规政策造成对部分人的歧视，这个社会一定会埋没人才。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在努力使全国人民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我年轻时受过多极不公平的打击，文革中北大毕业时又一次被“扫地出门”。人生的多次重挫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后再遇到什么“委屈”也就是“茶杯里的风波”了。

我在二中学习的三年正好赶上“大跃进”的年代，现在看来那时做的一些事有点荒唐。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锤炼了我的吃苦耐劳精神，使我一辈子受益。58年11月我们这批高二学生赶赴涟源支援大炼钢铁。我们每天割稻打谷十五六小时，深夜回来两脚是泥，顾不得洗脚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当时有句名言：“洗脚不如洗铺盖，洗铺盖不如横着盖”，因为横着盖脚露出来就不会弄脏被子了。我们曾到一个当地的土煤窑挖煤，煤窑没有运煤的升降机，要靠人把70-80斤重的一大筐煤揹上来。坑道很陡，大概有60度以上，揹煤的人整个身子几乎是横着的，几十米的竖坑道要靠一只手撑着，一步一步撑上来。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我一个15岁的小孩怎么能干这么重这么危险的活。超负荷的磨练使我再也不惧怕任何艰苦的工作。我写出这段历史故事，不是主张现在的高中生也要干当时那样的重活，而是告诉现在年轻学生，不管是体力上的“劳其筋骨”，还是脑力上的“苦其心志”，这种磨练是需要的。“庭院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年轻人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应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承蒙学校领导邀请，我回母校参观座谈两小时，看到母校环境大为改观，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十分高兴。座谈中谈到学生本人和家长、社会舆论都很关注高考的升学率，特别是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我听后深感忧虑。忧虑的不是二中进北大、清华的人数可能比不过长沙的重点中学，甚至会低于其他县级重点中学，而是以考上重点大学人数为办学方向这根指挥棒可能会贻害整整一代人。我在北大读了六年，接触过许许多多北大学生，从不认为北大的

学生多么优秀。多年的统计也表明，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除了出国读硕士、博士的比其他学校多一些外，对国家的贡献未必比其他学校强。办高中的目的并不只是为重点学校提供生源，更重要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公民。20年后，建设科技强国、经济强国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高中生身上。如果这一批人只关心自己鼻子底下这一点事，只关心自己能否进个好学校，找个又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成为一流国家就十分堪忧。

以魏源、蔡锷为代表的宝庆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年青一代应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唯家庭出身和唯学历出身都是误国误民的政策，违背“人人享有平等发展机会”这一基本原则。对二中过去的校友，不要以官衔职称论高低成败，应多宣传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祖国为家乡做出重大贡献的校友，使在校的学生感到“行行出状元”，“条条道路通罗马”。在结束本文时，让我对清人龚自珍的一首名诗做一点修改，赠送给母校师生：“九州生气恃人才，齐捧名校究可哀。我劝母校树新风，不拘一格育人才。”



个人简历:

李国杰，1943年5月出生，湖南邵阳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89年被聘为研究员。1990至2000年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2000-201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主要从事并行算法、高性能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了150多篇学术论文，合著了4本英文专著，出版了《创新求索录》个人文集。

主持研制成功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和曙光2000、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高性能通用CPU。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

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被选为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现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信息技术和新兴产业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等职。